



【名家背影】

## 气节陵夷谁独立

□肖复兴

《十力语要》卷四中，有这样一段话，记录了从来不读小说的熊十力读《儒林外史》的一则逸闻。他说：“吾平生不读小说，六年赴沪，舟中无聊，友人以《儒林外史》进。吾读之汗下，觉彼书之穷神尽态，如将一切人及吾身之千丑百怪，一一绘出，令吾藏身无地矣。”

熊十力头一次读小说，竟然将自己设身处地在小说之中，《儒林外史》中种种读书人的千丑百怪，成了他自己的一面镜子，照得他汗颜而藏身无地。这是只有熊十力这样的哲人与一般学者、评论家读小说的区别，很少有学者和评论家舍身试水，将小说作为洗濯藏污纳垢的自身的一池清水。

这是有原因的。熊十力一直坚持自己的“本心说”和“习心说”。这是熊十力的重要学说，也就是后来有人批判的唯心主义学说。他认为，“本心”是道德价值的源头，所以要坚持本心，寻找本心，发现本心。而“习心”则是从本心分化剥离出来的，是受到外界诱惑污染的异化之心。所以，他说拘泥于“习心”，掩蔽了“本心”，从而偏离了道德的源头，便产生了善与染的分化。

在这里，又出现了“善”与“染”两种概念，这是熊十力特别讲究的两个专有名词。他说：“染即是恶。”“徇形骸之私，便成乎恶。”他说“净即是善”，就是面对恶的种种诱惑“而动以不迷者”。

于是，他强调坚持“本心”就要“净习”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就是要和染出的种种恶做自觉的抵制乃至斗争。所谓“净习”，就是操守、涵养、思诚，这些已经被很多聪明的现代人和“精致的知识分子”称之为无用的别名而早已不屑一顾。熊十力却说：“学者功夫，只在克己去私，使本体得以发现。”只是，如今的大部分学者和熊十力一辈学者已不可同日而语。所谓学者功夫，早已经无师自通的“功夫在诗外”了。

作为我国新儒家的国学大师，熊十力的学说博大精深，很多我是不懂的。但是，这个“本心说”和“习心说”，还是多少可以明白一些的，因为不仅他说得十分清晰明了，而且具有现实意义。这不仅是他的哲学观，也是他的道德观，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哲学观和道德观。

明白了这一点，我们也就明白了，1946年，他的学生徐复观将他的《读经示要》一书送给蒋介石，蒋介石立刻送给他法币两百万元。熊十力很生气，责怪徐复观私自送书给蒋介石，

拒收这笔款项，表现出一位学人的操守，亦即他坚持的“本心”所要求的“净习”。后来，架不住徐复观反复劝说，熊十力勉强收下了，但马上将赠款转给了支那内学院，如此之钱毫不沾手，可称之为“净”。

我们也就明白了，1956年，熊十力的《原儒》一书出版，得稿费六千元人民币。这在当时不是一笔小数目，他拿一级教授最高的工资，每月也只有345元。六千元，相当于他一年半的工资总额，在北京可以买一套相当不错的四合院了。但他觉得当时国家经济困难，他不要这笔稿费。后来，也是人们反复劝说，他坚决表示只拿一半，不能再退让一步。

对于大多世人追逐的名与利，熊十力有自己的见解和操守。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有意思的话：“所谓功名富贵者，世人以之为乐也。世人之乐，志学者不以为乐也。不以为乐，则其不得之也，固不以为之之苦也。且世人之所谓乐，则心有所逐而生者也。既有所逐，则苦必随之。乐利者逐于利，则疲精散神于营谋之中，而患得患失之心生，虽得利而无片刻之安矣。乐名者逐于名，则徘徊周旋于人心风会迎合之中，而毁誉之情俱。虽得名，亦无自得之意矣。又且逐之物，必不能久，不能久，则失之而苦盖甚。”这段话，熊十力好像是针对今天而特意说的一样。他说得多么明白无误，名与利的追逐者，因为有了追逐(如今是名目繁多、花样百出的追逐)，苦便随之而来，因为那些都是熊十力所批判过的“习心”所致。志学者因为本来就没有想起追逐它们，不以为乐，便也不以为苦，而求得神清思澈、心地干净。万顷烟波鸥境界，九秋风露鹤精神，落得个手干净、心清爽，精神宁静致远。熊十力方才能够无论世事如何跌宕起伏变化而心有定海神针，坚持著书立说，一直坚持到77岁时完成他的最后一部著作《乾坤衍》。在这本书中，他夫子自道：“余患神经衰弱，盖历五十余年。平生常在疾苦中，而未尝一日废学停思……本书写于危病之中，而心地坦然，神思弗乱。”

只是，如今就像崔健的歌里唱的那样：不是我不明白，这世界变化快。熊十力所能做到的“神思弗乱”，已经让位于他所说的“逐”而纷乱如麻。这个“逐”，不仅属于他所说的世人，也属于不少志学者情不自禁的自选动作。不仅止于名与利，还要再加上权与色，如巴甫洛夫的一条高智商的犬，早知道以那条直线抄捷径去追逐他们所需要的东西。可怜的熊十力的“本心说”，在他的“习心说”面前，已经落败得丢盔弃甲。

想起熊十力的这些言说，便想起放翁曾经写过的诗句：气节陵夷谁独立，文章衰坏正横流。在这里，放翁说的文章并不只是说文字而已，而是世风，说知识分子的心思，也就是熊十力所说的“习心”。有了这样的“习心”的侵蚀，气节和操守才显得那样的艰难和可贵。可以说，熊十力就是这样在气节陵夷时候特立独行而远逝的一位哲人。

(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)

【文化杂谈】

## 大师与长寿

□徐宏力

国学大师长寿者居多，季羨林96岁，梁漱溟95岁，钱穆95岁，冯友兰95岁，南怀瑾94岁，任继愈93岁。如果扩大到艺术界，也大抵如此，书法家启功93岁，国画家齐白石93岁。这些人活在折腾的年代，命途多舛，有时物质拮据，有时精神受禁锢，如果顺风顺水，享年或许会更长。当然，业界也有人短命，但大都因特别变故所致，不妨碍统计学得出的优势结论。国学家长命，有历史传统。孔子享年73岁，孟子84岁，现在看不算什么，但在2500多年前，中国的人均寿命只有30多岁，70岁即被看做古稀之年。如果他们活在现代的生活与医疗条件下，“茶寿”(108岁)也是有可能的。

《黄帝内经》说：“上医治国，中医治人，下医治病。”给郎中安排的活儿太多了，好像是个万能职业。而且还有“医而优则仕”的味道，鼓励大夫们不务正业。古代官员的确写作“大夫”，只是读法不一样，全称是士大夫。《黄帝内经》无意鼓励医生们做官，而是想说明医学与国学相通。医道就是事道，医道就是人道，用来管理国家可以正社会，用来管理人民可以正众生，用来管理健康可以正性命。国医思维的基础是国学逻辑，国医都懂国学，而国学家不一定懂医术，但肯定懂医道。按照平衡规律行事，形成健康的工作方式与生活方式，很容易治疗自己的“未病”，想不长寿都难。

长寿是成为大师的结果，也是原因。不长寿，时间不够，学问做不到位；做透学问，优化心态，有助于长寿。季羨林先生说自己满意的东西都是七十岁以后写的，年轻时没有积累不厚重，年龄和阅历给学者送来大礼，这便叫炉火纯青。学问和艺术都是功夫活儿，靠日子陪伴，如果打磨不到质变的程度，总会让人觉得差点儿成色。如今有些国学成果在文字表面运行，掰开揉碎以后你会发现，真知灼见不多。究其原因，就是没把自己的生命体验做到学问中去，而且没进入人性深处，这就是性命双修的道理。

《论语》中说：“子之所慎：齐、战、疾。”战争与疾病都会把人弄死，与生命息息相关。“齐”为“斋”，《说文解字》释义：以手持肉的祭祀活动。人类面对灾难时力不从心，就恭请神灵保护生灵，原始宗教与生命质量相关。中国哲学认为，天地以生为道，人命是人性底线。孔丘三慎是中国文化的启动思想，他的入世学问是从这里出发的，生存是生存意义的

基础，首先要活着，然后才有资格考虑活着的价值。如果转化成现代人的说法就是：健康是1，事业、爱情、财富等其他因素都是后面的0，有了这个1，价值成10倍地增长；没有了这个1，人生全部归零。数字文化精准，可以简单地表达复杂的道理。

贝多芬在病榻上对舒伯特说，“我的灵魂是属于你的。”舒伯特死后长眠于贝多芬身旁，墓碑上写着：“死亡埋葬着巨大的财产，也埋葬着巨大的希望。”精神活力依附于生命动力，舒伯特践行着贝多芬的期待，代际辉煌在生命间传递。没有了肉体，精神还要向另外一条生命借路。

康有为先生说曾参在孔门弟子中是最为拘谨的一位，活得比较累。但小心点儿活着符合三慎说，从尊重生命的角度看，曾子可以说是楷模。他在病危时对弟子们说，自己一生“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”，从而保全了身体。身体得之于父母，也得之于天然，珍惜生命是尽孝道，也是尽天道。人生需要拼搏，但除非必要，不可拼命。生命缩短了，奉献也少了。儒家重视使命感，但是不能过誉那种不要命的奉献精神。人一生能做什么事情是有数的，能喘多少口气也是有数的。气数将尽，人会突然领悟到什么，到那时一切都晚了，还是早些防微杜渐的好。行止有度，匀态为常。像曾子一样全身而退，来时光洁，走时完美，不枉此生。

活着重要，是不是只要活着就行？那是苟活，肯定不行。生命不但有生理意义，还有社会意义。周敦颐说：“天以阳生万物，以阴成万物。生，仁也；成，义也。”他把“生成”与“仁义”联系起来，怎样活着决定着能不能活得长久。程颐说：“生之性便是仁。”动物关注进食与繁衍，人要添加另外的内容，本性超越本能。仁者爱人，体现着对生命的尊重。朱熹说，“仁是天地之生气。”行仁道者求和谐，少有悖逆，多有平和，心态好，病就少，这便是福报。“程说”以“生”为“仁”，“朱说”以“仁”为“生”，仁生相证，互为内涵。把它们融汇到一起，是大境界。

对于孔子在《论语》中“仁者寿”三个字，后学有非常细致的解读：“气之温和者寿，质至慈良者寿，量至宽宏者寿，言之简默者寿，此为仁之端也，所以仁者寿。”和善宽容，少说多做，这既是修身的要求，也有健身效果，在精神栖息中感悟肌体清爽。经典文化中有生命道理，可以培育健康智慧。

(本文作者为青岛大学教授)